

# 游心印外 悟道其中

## ——记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报告会及学术研讨会

本报记者 李百灵

5月21日,“大众篆刻——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报告会及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李岚清同志向大家介绍了他近年来从事篆刻艺术创作的初衷和感悟。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等,以及篆刻、书法、艺术界专家学者参加了报告会和研讨会。

“大众篆刻——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共展出400余方篆刻原石、550余件篆刻和200余件书法作品。展览以印、诗、书、画、图片、文字结合的丰富形式,全面展示了李岚清多年来的篆刻创作。

### 石印的“五言”之美

李岚清向大家介绍了他近年来从事篆刻艺术创作的初衷和感悟。他认为,篆刻与书法一样,是汉字艺术。与书法不同,篆刻讲究铁笔石趣,有着独特的艺术韵味。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承、发展和繁荣,汉字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汉字书写能力普遍衰退,这种情况实在让人担忧。李岚清说,“普及关于文字的艺术,使得下一代对文字有深厚的感情、昂扬的兴趣,是我提倡普及篆刻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岚清深爱篆刻,他的每一个印章都是一段经历,都有一个故事。他讲到,曾与夫人在家乡公园散步,偶见一小店招聘店员,就进去“应聘”,店主不认识他,回答说:“老先生,我们请不起你啊。”回去后,李岚清刻了一方“应聘不果”。此后又刻出“砍价失败”“老童生书房”等印章,记下生活趣事。

在篆刻材质方面,除了传统的印材之外,李岚清还尝试过木头、砖头、紫砂、瓷、大理石、玉、铜等。他用白垩纪时期的石头篆刻,因石头太硬而得了腱鞘炎。他甚至把老伴晒枕头的木板拿来篆刻,引得老伴大为不满。至今,他已刻了800多方印,数量之大,令人惊叹。

李岚清对于篆刻艺术有许多独到见解,其中以“五言”为精辟。他认为石可“言美”,篆刻首先要给人以审美的感受;石可“言志”,也就是篆刻的内容应该表达作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石可“言情”,在每一次创作中记录的都是友情、亲情、景情和心情;石可“言趣”,在篆刻的过程中充满着发现与创造的乐趣,也可与他人分享;石可“言事”,篆刻可以铭记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某一情

境,以印铭史,使得见印忆事,构成对历史的回溯和人生的回望。李岚清生动幽默的讲述,深刻独到的见解,以及他对篆刻的痴迷,深深地吸引了现场的观众,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 根植传统 视野宏阔

在随后的研讨会上,李岚清的篆刻艺术和报告会引发了诸多专家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李岚清在创作中特别注重根据题材选择篆刻线条,通过线条的韵味形成独特的意象。例如,他用错落的线条刻出的“乱石铺街”,用细整的线条刻出的“心平如水”。在“莫札特”这方印中,把字的笔画用五线谱上的音符和钢琴键盘的样子表现出来,使线条的处理带上音乐的元素,表明“莫札特”带着音符和钢琴键盘走向人间,使印章更有文化意味。仔细品味李岚清的每一方篆刻作品,都可以看到它们趣味横生,线条与传统线条大为不同,别有一种美感。“很多的线条,一般的篆刻家是做不到的。还有很多的篆刻,一般的专家也很难做到。”中国书协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评价道。

### “大众篆刻”创意新颖

“让篆刻艺术跟进时代步伐,贴近大众,走向现实生活,雅俗共赏,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李岚清从事篆刻创作的根本理念,也是这次展览的宗旨。“大众篆刻”作为一个崭新的命题,通过这次展览,已引起篆刻界的学术关注与讨论。

文艺美学方面的难题,就是小众和大众怎样统一。李岚清谈到小众的趣味不要固守自我,而是要推向大众。王岳川认为这非常重要。“篆刻这么高深,里面有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他把它推向大众,使我们想到一个问题:现在是‘化大众’还是‘大众化’?今天,很多人是‘大众化’,大众需要什么,我们迎合什么,大众趣味越来越低。相反,另一种是‘化大众’,用精英的、经典的、优雅的文化提升大众的品位,这样民族才

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凡历程和巨大变化,在创作中记录了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饱含深情地歌颂了祖国大好河山和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风貌。

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秘书长陈洪武认为,正是李岚清对音乐、诗、文、书画的融汇与认知,使其能够在宏阔的文化视野中不断地寻找并铸就自己的篆刻风格。“冲淡、雍容、悠游、清雅与幽默活泼的印风令人印象深刻。这源于李岚清站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中,以独特的艺术感悟,理性地给自己的篆刻书法艺术的追求明确方向。他善于在思考中索解篆刻书法艺术的个性与共性,并在融合中寻求升华,凸显其文化的力量与个性的魅力。”

### “大众篆刻”创意新颖

“让篆刻艺术跟进时代步伐,贴近大众,走向现实生活,雅俗共赏,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李岚清从事篆刻创作的根本理念,也是这次展览的宗旨。“大众篆刻”作为一个崭新的命题,通过这次展览,已引起篆刻界的学术关注与讨论。

文艺美学方面的难题,就是小众和大众怎样统一。李岚清谈到小众的趣味不要固守自我,而是要推向大众。王岳川认为这非常重要。“篆刻这么高深,里面有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他把它推向大众,使我们想到一个问题:现在是‘化大众’还是‘大众化’?今天,很多人是‘大众化’,大众需要什么,我们迎合什么,大众趣味越来越低。相反,另一种是‘化大众’,用精英的、经典的、优雅的文化提升大众的品位,这样民族才

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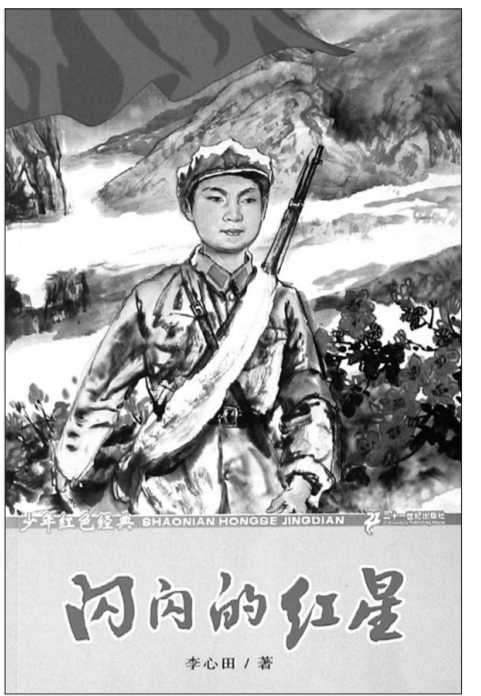
“‘大众篆刻’创意新颖,其实是创意人文。岚清同志有着深厚的人文修养、广博的艺术视野和多方面的知识积累,所以他的篆刻不但有独到的艺术语言和审美追求,而且还表现出难得的传统基础和历史渊源,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中国书协副主席、篆刻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书协主席、篆刻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书协主席曹泰达说。

“他强调大众篆刻,就是要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书协理事、篆刻委员会副主任、西冷印社社长李刚田表示,“一个80岁的老人,锲而不舍,在这个过程中使晚年生活充实,也感受艺术,感受人生。李岚清的篆刻是本原的、纯真的,他在享受过程。这一点也给我们职业印人一种启示。”

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赵长青表示,李岚清同志的学术报告是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站在中华文化或者是大文化的高度,以政治家的胸怀、学者的深厚学养,以及艺术家的审美、哲人的思考,生动有趣地给我们回答了为什么学篆刻,怎么去篆刻,篆刻什么内容。

“他提醒我们艺术的传承和创新的规律,这对我们都非常有启发。篆刻是属于文化的,要回归到文化的本体,去功利化。他这样以很超脱的心态进行篆刻艺术的创作,才可能真正地发展篆刻艺术。”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说。

无论从展览还是报告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李岚清始终将“活动”“创作”和“追求”放在传统文化和时代生活的大背景下进行,让艺术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大众,走近现实生活。



## 闪闪的红星 灿灿的光芒

高昌

“一九三四年,我七岁。”

“我五岁那年,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

这种句型,在新时期以来的很多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尤其是一些带有先锋色彩的作家。很多评论家称赞这种语言方式的新颖和“先进”,说是从外国的什么流派什么主义那里学来的。而我读到这种句型,却觉不出多少新鲜感。因为早在李心田先生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中,我就读过这种自叙体的行文句式了。

小说《闪闪的红星》,是我少年时期很喜爱的一部作品。那曲折的情节,精彩的话语,尤其是细腻的儿童心理描绘,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在学校操场的大树下坐着,在防震棚临时改建的教室里,在烧火做饭时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打开这本书继续看……我随着潘冬子的故事而悲痛,而欣喜,而愤恨,而兴奋。相隔几十年后重读这部红色经典,仍然很激动。

当年由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非常成功,其中的一些红歌至今到处传唱,比如:“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跟电影的巨大影响相比,小说原著的文本意义和创新精神,似乎被掩盖了。

《闪闪的红星》尽管产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但和同时代一些艺术粗糙、思想模式化、主题肤浅的作品相比,却显示了令人感叹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其中的很多忠实于生活并遵循艺术规律的细节描写,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叹不已。比如对冬子在茂源米店学徒经历的生动叙述,以及电影改编时被删掉的冬子寻找父亲的那些曲折描写,都有很多非常高超的结构技巧,体现了作家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而其中最能显示作家创作水平的,是他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不仅潘冬子、冬子妈、宋老爹等正面人物形象塑造得真实可信,就是胡汉三、胖老板等反面人物,作者也不仅用漫画化的笔法勾画简单的脸谱,而同样是通过认真生动的

细节刻画,把他们的丑恶内心鲜明呈现在读者面前。

几十年来,《闪闪的红星》被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再版几十次。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爱它?除了艺术上的成就,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那种美好的理想追求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冬子对“土豪劣绅全打倒了”“再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的向往,柳溪的乡亲们为了争取自由、翻身做主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都是那样的让人感动,让人振奋,让人共鸣。那颗闪闪的红星象征着希望和力量,象征着信念和光明,象征着不屈的骨气和不朽的人生。那灿灿的光芒,穿透黑暗和风雨,永远照耀在人们的心上。

重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正是2011年的“六一”儿童节。六月的大地,流辉溢彩;六月的天空,湛蓝明亮。六月里的童年,鲜花般的童年,是多么美好啊。

今天的孩子们是快乐的,幸福的,明天的孩子们是更快乐的,更幸福的。

在这阳光灿烂、姹紫嫣红的日子里,在孩子们自己的节日里,我祝愿他们健康成长,同时也想推荐他们读一读《闪闪的红星》,了解一下潘冬子们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想一想自己的童年跟潘冬子们的童年有什么不同。



### 动态

## 国服论坛:传承中华服饰文明

5月29日,中国国服协会、中国服饰文化联合会、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促进会等在京共同举办了2011中国国服论坛。来自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10多位专家学者就国服与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展开探讨。

与会专家表示,国服作为国家的标志性服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和审美情趣,对于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号召力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世界各国,尤其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均有自己的特色服饰。如印度的

“纱丽”、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等。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李延声曾提交做好国服的研制、推广工作的提案。

国服是文化软实力的象征,是增强全球华人归属感的载体。专家们呼吁,在民族传统服饰上改革创新,做好国服研制并进行大力推广。中国国服协会副会长陈元麟介绍说,中国国服协会经过10年研制,在本次论坛展示的三大系列60余种“国服”,以“礼”为魂,以“锦”为材,昭示了中华传统服饰文明的复兴。(哈宁)

## 民族文学创作应力避神秘化

5月26日至30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中青年评论家交流会在湖南省常德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作家就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现状、未来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回到日常,回到现实,回到当下”是评论家李美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期待。她认为,由于地域、宗教、历史传统等原因,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神秘化特征,作为文化载体的少数民族文学,也相应地具备神秘化特征,这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和独特性,但

但对于民族文化的刻意体现一方面会突出其传奇性、异域性、神秘化,另一方面又会致文化的异化,使其与生活脱离,成为一种表演。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应该警惕神秘化的艺术诱惑,以对猎奇的拒绝、对生活的扎实表现来达到理想的艺术境界。中央民族大学文学教授敬文东则在思考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深刻影响。

此外,评论家们还对少数民族文学前辈创作经验、美学追求做了系统阐释,对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创作特征进行了分析与论述。(珊珊)

## 戴爱莲的人品 舞品 学品

### ——“名家忆大家”追思活动综述

李天翼 本报记者 刘茜

为纪念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戴爱莲诞辰95周年和逝世5周年,5月18日至25日,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协办,中国舞蹈博物馆承办的纪念戴爱莲诞辰95周年“名家忆大家”追思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邀请白淑湘、赵汝衡、资华筠等7位舞蹈界知名学者、专家做讲座。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兼中国舞蹈博物馆馆长李续致开幕辞,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戴爱莲之女叶明等参加开幕式。

各讲座回顾和梳理了戴爱莲为新中国舞蹈事业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专家们认为,戴爱莲先生的人品、舞品、学品感染了一代舞蹈人,值得继续继承和发扬。

舞蹈教育之开拓者

原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白淑湘称戴爱莲为“新中国舞蹈之母”,以此表达了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情。

1916年,戴爱莲出生在墨西哥群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4岁赴英国伦敦,先后师从安东·道林和玛丽·魏格曼学习芭蕾舞和现代舞。她在两者之间博取众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40年,戴爱莲毅然返回了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

戴爱莲回国后,先后在瑶族、彝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她潜心学习,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北京舞蹈学院彭松教授说:“她当年回国,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追寻中华文化之根,她一头扎进了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

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冯双白认为:戴先生开辟到了边疆民间采风的创作之路。之后的一大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家,像斯琴塔日哈、刀美兰、贾作光,包括现在的杨丽萍等,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中国戏剧学院舞蹈团;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

身)的教学工作;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领导;还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迪说,她跟戴爱莲先生的师生关系始于1980年,在排练舞剧《天鹅湖》时,戴爱莲先生曾经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为她排演“白天鹅”的出场。戴爱莲对她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在动作形式上的到位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用内心情感的外露去感染观众。

舞蹈史学家王克芬介绍,她曾在解放前在上海跟随戴爱莲学舞。她认为,戴爱莲给自己的不仅是舞蹈艺术上的指导,还有生活上的关心。当年,在上海乐舞学院交费学习的学生人数并不多,而戴爱莲教自己认为有前途的学生又是全部免费的,所以,当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 创作博采各舞种之长

舞蹈艺术家、舞蹈理论家资华筠说:“戴先生虽然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她对民族艺术和东方美学十分喜爱。她80多岁还坐着拖拉机到云南村寨学舞蹈。她对大众的创造力非常尊重,对民间艺术有很强的提炼和升华能力,能够准确把握不同民族舞蹈的审美特质。”

赵汝衡说,在和戴先生交往的过程中学会了许许多多做事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戴先生曾经多次申请入党,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所迫,留在党外的戴先生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直到临终前,她的申请才被批准。戴先生躺在病床上宣誓入党的情景始终震撼着她的心。

## 呈中国舞蹈美学之神韵

张法

中国舞蹈源远流长,诗乐舞合一的原始之乐极盛于远古,但在春秋战国的大变动中,舞在其中的乐一变而为三:一为朝廷仪式之舞乐,太神圣又太固陋;二为宫廷娱乐之舞乐,丰富而精致但文化地位不高;三为民间舞乐,丰富多样但一部分在宋元明清转为戏曲,已非纯粹的舞,未进入戏曲的各种民间舞蹈地位更低于戏曲。从而舞蹈的理论总结基本上被主流文化的书写阶层(士人)所忽视。因此,悠悠千年,舞蹈虽丰富,对舞蹈的理论总结却大大地落后于诗、文、书、画、戏曲、园林等其他艺术。可以说,中国舞蹈理论一方面内藏在丰富多彩的舞蹈之中(因舞蹈本身是一种过程艺术而古代没有录像技术,因此已大量地消失),另一方面分散在各种文化典籍之中(因舞蹈与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而必然存在)。如何把中国舞蹈美学理论从散乱的材料中整理出来,是当今中国舞蹈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袁禾的《中国舞蹈美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是这一工作的实绩。初读此书,几个特点惹人关注。

第一,理论的由隐而显。此书让隐藏在各类文献之中的舞蹈美学由隐而显,呈现出了一种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理论体系雏形。作者从零散资料中寻宝觅珠,又将所得之宝珠以现代的解释逻辑加以贯穿和解说,形成一种理论形态。人们也许还会问,所寻之宝之珠何以就是这些,还有没有别样?对这些宝和珠所做的贯穿和解说何以如此,还可不可以呈现为其他样式?无论人们会不会这样问或者还有其他的提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书中目前的所寻之宝和所呈之论,抓住了中国舞蹈美学的精神。

第二,艺术门类的整体关联。作者对舞蹈美学的特质,多从中国艺术的整体性中去予以揭示,使舞蹈美学的精神和特质从与其他艺术门类,如与诗、书、画、戏之汇通中得以呈现。比如书法的“若绝若连,若飞若行”(卫恒《四体书势》)与舞蹈的“联翩络绎,乍续乍绝”(张衡《观舞赋》)有一种汇通;又如,画中之山,“得环抱起伏之势,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挂脚。”画中之水“得浪涛萦回之势,如绘如云,如奔如怒”(唐志契《绘事微言》),与舞蹈的起伏进退、圆周转环具有同一情调。诗词戏曲小说

的境界追求,与舞蹈的境界追求,体现了相同的文化境界。这些从各门艺术的相通性着眼对舞蹈的论述,让人直接进入到了舞蹈美学的本质之中。

第三,美学理论的上下汇通。书中呈出了9对中国舞蹈的美学范畴:形、神;气、韵;象、意;情、境;妙、味;雅、俗;轻、重;合、和;技、法。虽然书中对这些范畴的言说,在新见迭出的同时,也有可以讨论之处,但通过这些范畴,已经把中国舞蹈的范畴与中国美学的范畴合为一体。一方面把舞蹈美学提升到了中国美学的高度,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灌注到了舞蹈美学之中,中国舞蹈与中国美学的关联,就在这些范畴的运用中,贯穿起来,融汇起来,既让人从中国美学的角度理解了舞蹈美学,又让人从舞蹈美学的角度理解了中国美学。

第四,舞蹈的文化境界。此书把舞蹈美学的特质与中国文化的特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中国舞蹈的范式归为两点:圆与线。圆是中国的天道,亦是舞蹈的舞道。从中国舞蹈划圆的提、沉、冲、靠、含、腆、移的运动过程和运动形态中,从通过这些形态呈现出来的圆融、圆通、圆浑、圆转、圆润、圆柔、圆满、圆美的多样境界中,达到了舞蹈与文化的合一。中国艺术是线的艺术,是现代学术对古典艺术的总结。中国的宇宙由气化万物而成,中国舞蹈是与之神合线的运动,太极曲线和龙形曲线构成舞蹈之圆的文化基础,行云流水是舞蹈行进的具体境界。从圆与线中,可以感到中国舞蹈美学与中国文化精神浑然一体。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舞呈现了三大形态:一是以李正一、唐满城为代表的京昆古典舞体系,以戏曲舞蹈为基础加上武术等元素而成。二是以高金荣为代表的学人从敦煌的舞蹈形象中提炼出的另一种敦煌古典舞型的体系。三是以孙颖为代表的学人由唐而汉,从更古的资料中提炼出的又一种汉唐古典舞型的体系。中国古典舞的三种进路,在取得艺术程式的重大进展的同时,也需要中国舞蹈美学从理论上予以支持。怎样把中国舞蹈美学更好地呈现出来,成为当今舞蹈学界虽然艰难却必然去做的事。袁禾《中国舞蹈美学》正走在这一让中国舞蹈和中国舞学都有重要意义的路上。